

【俄罗斯文学】

19世纪俄国文学经典与西伯利亚

——兼论西伯利亚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意义

徐 乐

【摘 要】西伯利亚在俄国地缘政治和民族历史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向欧洲部分的俄国提出了特别的智识和心理挑战,启动了俄国思想界积极地感知、理解和书写陌生的东方边界,从而在概念上将西伯利亚纳入俄国文化共同体的过程。这一过程在19世纪经典文学中孕育出丰富的成果,在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四个层面塑造出西伯利亚的矛盾形象。凭借经典文学对西伯利亚的多重表征,俄国科学界、文学界与商业、政治精英对于克服西伯利亚的自然条件并将其吸纳进俄国文明空间达成了共识,并以艺术的方式将其整合和呈现为一种有关世界秩序的神话,意图激发俄罗斯民族改造自身性格并且担负“神的使命”以领导世界的欲望。

【关键词】俄国经典文学;西伯利亚;民族财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

【作者简介】徐乐,197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学习与探索》(哈尔滨),2019.10.164~170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WS03_2018_SCX_3738)。

一、被压制的地位和巨大的潜力

自1581年叶尔马克率部入侵西伯利亚汗国以来,至19世纪时,西伯利亚不但在地缘政治上被俄罗斯帝国彻底征服,而且作为某种概念被纳入了俄罗斯文化的共同体。废除农奴制后,俄国开启现代化进程,资本主义和国内统一市场的高歌猛进,需要提供大量稳定的工业和农业原材料,西伯利亚蕴藏着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袤无垠的土地使其成为俄国经济发展和对外扩张的重要基地。但在十月革命前,帝俄政府始终视西伯利亚为“国内殖民地”,冷漠地对待该地区自身的需求和发展愿景,甚至有意识地遏制它的文化进程:一方面将西伯利亚用作苦役和流放之地;另一方面则将其筹划为依附于欧俄核心区的殖民边疆,对之横征暴敛,强行向各少数民族勒索毛皮和其他贵重物资,以牺牲西伯利亚本地利益为代价换取欧俄地区的快速现代化。1905年革命后力推土地改革、开发帝国边疆和大规模迁移人口到乌拉尔山以东地区的俄国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

平,在1911年出版的《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流域之行》中不加隐讳地写道:“我们在西伯利亚的总体经济政策应当建立在承认这一事实的基础上,即西伯利亚还将长时间地充作农业、采掘和向全世界市场提供原料的地方。”^[1]

俄国的国家战略定位和西伯利亚的自然地理历史条件,使得该地区经济发展十分滞后,结构单一,科技和生产工艺水平低下,生态环境也遭到大肆破坏。而在西伯利亚高度垄断的原料加工和采掘工业中的工人阶级,虽然每日从事长达13—15小时的劳动,但薪资极低,生计艰难,困苦不堪。总之,在帝俄时代对西伯利亚的开发“并非着眼于振兴西伯利亚,而是立足于发展欧俄。尽管西伯利亚同俄罗斯帝国其他地区相比存在较多优势,但是该地区开发及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却由于诸多内外因素而受到严重制约”^[2]。

但是俄罗斯民族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却始终把开发和改造西伯利亚与俄国的未来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起。18世纪俄国伟大的学者和诗人罗蒙诺索夫梦想祖国未来的繁荣,断言“俄国的强盛有赖于西伯利亚和北冰洋”^[1]。在他看来,远东主题与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息息相关。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良心的代表拉吉舍夫在1791年7月从托波尔斯克发出的书信中感叹道:“西伯利亚的自然馈赠是多么丰富!这是一个多么富饶的边区!……它一旦有人定居,将在世界编年史上扮演伟大的角色!”^[2]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也预言“西伯利亚的前途不可限量”,一旦“阿穆尔河口开辟了航道,美国与西伯利亚在中国附近相会”,那时“太平洋是未来的地中海”^[3]。契诃夫在去往萨哈林的旅途中也盛赞:“日后会成为西伯利亚诗人取之不尽的金矿的大自然,新奇、宏伟、瑰丽的大自然。”当他饱览豪迈壮丽的叶尼塞河和奔流迅疾的河水的时候,不由得幻想起西伯利亚光辉灿烂的未来景象:“日后会有多么充实、明智、勇敢的生活使得两岸大放光彩啊!”^[4]

二、丰饶的北境和民族的财富

西伯利亚位于欧亚分界线乌拉尔山脉以东,北至北冰洋,东抵太平洋沿岸,南邻中国、蒙古边界,西南与中亚接壤,面积达1276万平方公里,占亚洲陆地面积的1/3以上。在这里生活着不同语系、不同肤色的大小民族近30个。该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水系发达,植被茂盛,生活着大量野生动物。在俄国的帝俄、苏联和后苏联时期,西伯利亚的原材料、粮食、毛皮、金银、矿藏、能源出口构成了国家收入的重要甚至主要部分。西伯利亚在俄国的现代化和国家实力增长的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今仍然具有巨大的潜能有待开发。据统计:“16-17世纪,西伯利亚毛皮占俄国年度预算的四分之一、外汇收入的三分之一,享有‘软黄金’‘金羊毛’之称……1908-1913年,在西伯利亚获取的貂皮、松鼠皮分别占俄国的97%和96%,黄鼬皮、棕熊皮分别占75%和72%,白鼬皮、兔皮分别占65%和58%。至十月革命前,西伯利亚毛皮占俄国皮货交易额的80%左右,占世界毛皮贸易额的44%,在世界毛皮交易中心莱比锡和伦敦居主导地位。”黄金是俄国出口创汇的另一主打

产品,而西伯利亚在俄国黄金开采业中的地位首屈一指:“1850年俄国黄金产量为1500普特,其中西伯利亚占66.7%,为1000普特;1900年俄国黄金产量为2300普特,西伯利亚为1600普特,占69.6%;1910年俄国黄金产量为3136普特,其中西伯利亚为2224普特,占71%。”西伯利亚的黄金产量在俄国黄金总产量中的比重逐年上升。此外,19-20世纪之交,西伯利亚的奶油业也成为一项重要出口创汇的来源,西伯利亚的奶油产量短时间内远超俄国其他地方的传统奶油生产地^[5],而苏联解体后俄国财政收入也主要来源于西伯利亚出产的石油。

西伯利亚的辽阔土地和丰饶物产在18世纪古典主义的颂诗中得到宣扬,罗蒙诺索夫把这个独一无二的北境空间视作上帝赐予俄国君王的“幸福的馈赠”,号召俄国人用科学和劳动来开发这个无边的“宝藏”“黄金矿脉”。在诗中他透过严寒的白雪热情地赞颂勒拿河的雄伟气魄:

尽管终年积雪/覆盖着北境王国,/北方之神用冻僵的双翼/吹拂你的旗帜;/但在冰封的群山之间/上帝的奇迹多么伟大:/此处有清澈湍急的勒拿河,/就像尼罗河,滋养着人民,/它的河岸最终销蚀,/它的广阔堪比海洋^[6]。

西伯利亚的豪迈壮丽的自然风光自有其无尽的魅力。冈察洛夫在穿越西伯利亚途经雅库特省的卡缅斯克时感叹说:“从鄂霍次克海到这里,行程共二千俄里,从这里到伊尔库茨克还有二千。广袤的土地啊!在这里旅行之后,真会觉得俄国的欧洲部分是区区弹丸之地了!……仍然是荒漠,仍然是勒拿河!我刚刚走的是林间夜路。披雪挂霜的林景真美啊!百年老松和落叶松,或密集簇拥,或离群索居。新月一出,银光洒泻,映着林中万千仪态!凭你的想象力去驰骋纵横吧!”^[7]另一位去萨哈林考察的经典作家契诃夫在西伯利亚特写集中讴歌了叶尼塞河的“新奇、宏伟、瑰丽”,并且拿它与处在俄国文明中心的伏尔加河比较:“我有生以来从没见过比叶尼塞更壮丽的河。就算伏尔加河是一个盛装、温雅、忧郁的美人吧,而叶尼塞河却是一个强有力的、狂热的、不知该

怎样处置自己的力量和青春的勇士。在伏尔加河上,人先是心情豪迈,最后却以一种被称为歌曲的呻吟结束:人的灿烂的、黄金般的希望换成一种通常称为俄国的悲观主义的虚弱;可是在叶尼塞河上,生活却从呻吟开始,而以我们在梦里都见不到的豪迈结束。”^[540]

由于西伯利亚资源丰富且地处偏远北境,农奴制还没有来得及侵入这片富饶的土地,因此去往西伯利亚的俄国人只需足够勤劳、勇敢,丢弃腐化堕落的地主生活,忘掉上流社会弄虚作假的习惯,就能在西伯利亚发掘出巨大的财富。这样的信念在俄国人的意识中逐渐固定下来,形成了十分富有民族性色彩的西伯利亚创业神话,这在冯维辛的戏剧《纨绔少年》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剧中正义与智慧的化身斯塔罗杜姆声称他在西伯利亚“挣钱不用昧良心、不必钻营、不必挖祖国墙角”,凭着诚实的劳动,他挣到一笔可观的身家,使得侄女的生活有了物质保障^[8]。涅克拉索夫在诗作《祖父》中描绘了“西伯利亚的乌托邦时空体——自由的、富饶的边区”^[9],被流放到那里的旧教派信徒凭借自由的劳动在西伯利亚创造出富裕的奇迹:

那里有多少头猪啊,萨沙,/村前的鹅群雪白一片,/足足拉了半里长,/那里耕种的田地有多少啊,/那里的牲畜成群成行!/居民们长得高大而又好看,/而精力永远是那么健旺;/就是现在,马儿正拉着/包铁皮的结实的大车/把成百普特的货物运往工厂/那里的马喂得肥肥的,/那里的人吃得饱饱的^{[10]194-195}。

由此可见,在俄国经典作家的想象中,西伯利亚是一片尚未被征服的苍茫净土,只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就能将它的资源转化为民族的财富。

三、死亡的国度和民族的创伤

西伯利亚的富饶远景只是少数俄国知识分子的远见卓识,而在19世纪大多数俄国人的心目中,西伯利亚则是气候恶劣、土地贫瘠、荒无人烟的恐怖王国,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和生活。在西伯利亚出生的俄国当代作家拉斯普京在《西伯利亚,西伯利亚……》一书中形象地指出:“被暴利驱动的狂潮

此起彼伏——为了获取皮毛、长毛象的骨头,获取金子和其他贵重金属;在糟蹋、挑选完这里的财富之后,在将西伯利亚的森林和西伯利亚地下资源尽其所能地劫掠一空之后,寻求一时之快的探险家们便打道回府,并且散播这样一些阴暗的流言,说西伯利亚是死寂的和贫乏的,既不能让人飞黄腾达,也不能让人吃饱喝足。”^[11]

的确,富饶的北太平洋地区对贪婪的俄国探险家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为适应俄国侵占北方领土、进行殖民统治的需要,1799年俄国成立了俄美公司,专门代理帝俄政府掠夺远东和北美阿拉斯加地区的资源,在19世纪异常兴旺活跃。在政府的支持下拥有完全的和无限制的皮毛专营权后,俄美公司肆意捕猎,导致当地生态严重破坏,资源枯竭。而官方殖民者为掩盖自己破坏西伯利亚环境的罪行,大肆宣扬西伯利亚是荒蛮之地,把对殖民地的野蛮劫掠吹嘘成英雄主义地对鸟兽难觅的险恶国度的征服。即便是冈察洛夫也站在帝国立场上替殖民者辩护说:“到那里是为了什么?去夺取楚科奇人的土地,收纳贡赋吗?至今,楚科奇人仍停留在野人状态……他们那里完全无利可图!但是,为什么还要到那里去呢?不过是为了使他们摆脱野蛮状态,过上人的生活。完全是大公无私的行为。”^{[17]56}

18世纪初的西伯利亚历史学家斯洛夫佐夫断言“西伯利亚被打上了遭人弃绝的印记”。而他的身居高位的改革家朋友斯佩兰斯基在1819-1921年担任西伯利亚总督时,并没有把自己的履职说成向东方的推进,而是在给自己的志同道合者斯托雷平写信时说:“我越往西伯利亚的底部下沉,越是看到更多的恶,而且是令人发指的恶。”^[12]

西伯利亚的极度寒冷与荒凉在相关文本中被书写为广泛流传的神话,因此在俄国人的思想中呈现为对人极不友好的负面形象,让那些从未亲身到过西伯利亚的俄国人心存恐惧。十二月党诗人雷列耶夫革命后即被处死,因而没有被流放至西伯利亚,他在长诗《沃伊纳洛夫斯基》中把威胁着自己和友人命运的西伯利亚称为“暴风雪的国度”“寒冷王国”“夜

的王国”，描绘它的极度寒冷和了无生趣：

这片国度的阴森的大自然/永远严酷和野蛮；/
愤怒的河流在咆哮，/恶劣的天气在肆虐，/时常阴云
密布……

而那些被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俄国人则饱经忧
患，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这个了无生趣的国度，/是一座羁押着众多囚徒
的监狱，/没有谁会来拜访，/此处的冬季令人恐惧^[1]。

另一位从未到过西伯利亚的俄国经典文学诗人
涅克拉索夫受十二月党人妻子事迹的感召，在描写
十二月党人革命的著名的诗歌两部曲《俄罗斯妇女》
（《特鲁别茨卡雅公爵夫人》《沃尔康斯卡雅公爵夫
人》）中，根据翻阅的史料和随同丈夫奔赴西伯利亚
的公爵夫人的笔记，描绘了西伯利亚如同地狱般阴
森恐怖的景象和革命者遭受的巨大痛苦。俄国文
论家秋帕使用人类学家杰内普和特纳提出的“更始
仪式”“阈限”概念，论证西伯利亚时空体作为“更始
仪式的过渡礼仪的阈限阶段”，贯穿了涅克拉索夫
两部曲长诗的整体结构，而两位公爵夫人在西伯利
亚的行走则是在“阈限的（临界的）时空体”内“体验死
亡”^{[14]28}。在《特鲁别茨卡雅公爵夫人》中，西伯利亚
省长担任了类似但丁笔下地狱引导者的职责，向女
主人公警告她将要踏入的“可怕的国度”里的险恶；
而在《沃尔康斯卡雅公爵夫人》中，则直接描写了英
勇的妻子如同天使降临地狱般走向西伯利亚的矿坑
深处，而打着火炬引导她进入地狱的则是看押犯人的
哨兵：

哨兵拗不过我的痛哭悲泣，/我求他就好像求上
帝！/他点燃了一盏灯（一种火炬），/我走进了一座地
窖，/久久往下走着，越来越低；/在走廊里/幽暗而又
窒闷，那儿结出的霉菌像花纹，/那儿静静地流着一
道小溪，/再往下便汇成一汪汪积水^{[10]308-309}。

难怪，当两位公爵夫人毅然放弃贵族特权追随
丈夫离开俄国中心地区奔赴西伯利亚时，人们都把
她们看作死人：“公爵夫人身穿一色的黑服，/独坐车
中，脸色苍白得像个死人……”“我的亲人们严肃地
沉默不语，/别离竟是这样黯然无声。/我想：‘对家庭

来说，我已经死去……’”^{[10]213,279}把西伯利亚等同于死
亡之国，这样的感受在俄国经典文学中持续：当契诃
夫不顾一切要走上西伯利亚大道时，人们都带着怜
悯的神情瞧着他，“仿佛瞧着一个死人似的”^{[15]32}。

与死亡国度相联系，西伯利亚空间象征着俄罗
斯帝国权力的皮鞭，时时刻刻威胁着各个等级的臣
民，成为隐藏在俄国人内心深处的民族创伤。对于
从未到过西伯利亚的俄国人而言，最恐怖的地方莫
过于那深入地下的矿坑：“那里永远是死一般的沉
寂，/那里是长夜难明一片黑暗……”^{[10]223}苦役犯们在
矿坑里饱受折磨。乌斯宾斯基在系列随笔《拜访移
民者的旅行》的第一篇中也写道：西伯利亚人“在地
下爬行，爬进极难通行的和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幽
晦的深处，在结冰的泥泞和结冰的水中蠕动，在皮鞭
的抽打下、在子弹的威胁下、在劣质酒的引诱下开采
资源”。但作者也承认，“之所以想起这些极其阴暗
的画面，是因为阅读了关于西伯利亚的文献”^[15]。

由此可见，在西伯利亚服苦役，在俄国人的意识
中成为最可怕的惩罚。在果戈理的短篇小说《伊凡·
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中，
主人公之一写呈文请求将自己的对头“羁以镣铐，解
交监狱或国立惩治监狱……必要时发往西伯利亚服
劳役数年”^[16]，在《钦差大臣》中县城的商人向假冒
的钦差大臣告发县长强收贿赂，后者随口应付道：“真
是个坏蛋！光冲这一点，就该把他充军到西伯利亚
去。”而县长得知后又警告商人：“我要是给你揭一揭
底，就能把你发配到西伯利亚去。”^[17]

四、复活的圣地和世界的救赎

帝俄治下的西伯利亚流放和苦役威胁并非空穴
来风，无论是刑事犯还是十二月党人及此后大批的
政治流放犯，他们在西伯利亚付出的劳动和经受的
苦难都汇入了俄罗斯充满悲剧性的历史，推动帝国
殖民和开发异域空间的进程，最终也激发了俄国人在
精神上改造自身和在思想上征服世界的欲望。在《俄
罗斯妇女》中，涅克拉索夫歌颂被流放的十二月党
人即使身处残酷的地狱，也仍然在为祖国开采资源：

活儿在镣铐声的伴奏下紧张地进行,/他们在歌声的伴奏下正在深渊上劳动!/铁锹和铁锤敲打在/矿山的有弹性的心胸。/多艰巨的劳动!/又是何等的英勇!/那在一旁闪亮的,是采来的一块块矿石,/他们答应要作慷慨的礼贡^{[10]312-313}。

涅克拉索夫长诗的先驱是普希金致十二月党人的诗函《在西伯利亚矿山的深处……》,后者同样受到沃尔康斯卡雅公爵夫人义举的感召。在这首诗里,普希金创造出“昏暗潮湿的矿坑”“阴暗的闸门”“服苦役的黑窝”“沉重的枷锁”“监牢”这样一些后来标志着西伯利亚苦难特征的符号,它们塑造了19世纪俄国人想象西伯利亚的时空体模型,并且被涅克拉索夫等经典作家一再沿用。对这首诗帕解读说,如果有一天尼古拉一世能够理解十二月党人的“高傲的耐心”“痛苦的劳役”和“崇高的意图的思想”,就会立刻把他们召回身边,这样的完美结局正符合“更始仪式的完成阶段”^{[14]31}:

在西伯利亚矿山的深处,/保持住你们高傲的耐心,/你们的思想的崇高的意图/和痛苦的劳役不会消泯。/沉重的枷锁定会被打断,/监牢会崩塌——在监狱入口,/自由会欢快地和你们握手,/弟兄们将交给你们刀剑^[18]。

在诗歌的结尾,普希金呼吁友人要熬过神话式的磨难、沉沦和象征性的死亡,在西伯利亚更新自己的个性和生活,以新的民族英雄身份胜利返回俄罗斯建功立业。收到普希金诗函后,十二月党诗人奥多耶夫斯基写诗应答:

我们悲惨的事业将不会落空:/星星之火必将燃成熊熊的烈焰——/我们信奉东正教的人民/将集合在神圣的旗帜下面^[19]。

在西伯利亚死亡之国的涅槃重生,以此来修复民族的集体创伤,必须要在东正教的“神圣的旗帜下”,这一信念潜藏在列斯科夫、柯罗连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后来俄国经典作家的西伯利亚作品中,而他们的主人公们将从这个死亡之地获得精神复活和拯救世界的力量。

19世纪下半叶,在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

进步理念和人道主义思潮冲击下,俄国的社会意识有了明显的提高,开始对西伯利亚的肉体惩罚、永久拘役、任意虐待、劳动力的浪费这些荒谬至极的现象进行反思。例如契诃夫在去往萨哈林前给苏沃林写信,解释他为何甘冒肺结核恶化的风险做实地调查:西伯利亚是一个充满不堪忍受的痛苦的苦役之地,代表着欧洲文明和法制的最高成就的“我们”,无情地给“罪犯”戴上手铐脚镣,驱使他们在极端寒冷的天气中走过漫长荒凉的西伯利亚大道,把这些上百万的俄国同胞无限期地囚禁在监狱里,毫无道理而且野蛮地折磨他们的身体和心灵。在亲身接触并考察了苦役犯和流放犯的思想行为状态后,契诃夫认为,帝俄政府出于惩戒罪犯和殖民边疆双重目的,将囚犯终身流放西伯利亚的刑罚,最大的恶果是使这些被迫的移民“永远离开了正常的人类生活环境”^{[5]27}。于是他们酗酒、淫乱、染上梅毒、腐化堕落、繁殖罪孽:“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已经不是人,而是野兽了;照老大爷,我的马车夫的看法,他们就是到了来世,也会遭殃:他们会因为犯罪而下地狱。”^{[5]7}而那些“身穿崭新的文官制服的年轻知识分子”^[20]“把自己称为社会、知识分子的人”^[21],则在规规矩矩、一丝不苟地执行公务,维持着帝国在西伯利亚进行惩罚和殖民的双重制度。

在俄国经典文学家看来,19世纪的世界,强权、暴力以法律和文明的名义,压迫和束缚人的个性,排斥自由的生命活动。俄国思想家们同样在这一点上与西方法律观进行论战。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认为,法律和神恩是相互冲突的,法律伦理学是法利赛主义对神的恩赐世界、精神社会的入侵,执法者如果忘记了基督教的爱,则他们越是勤勉地执行惩戒工作,越会导致自己心灵的枯竭,用道德的和形式的诡辩来为自己开脱。“这时,心灵枯竭的人就将审判罪人,但没有怜悯,也没有爱。在心灵枯竭的人看来,罪人应该受苦,他们需要痛苦,受苦对他们是件好事。”^{[22]26} 忠于职守的效果适得其反:“对法律的完全执行和完全的洁净并不能拯救人,不能开辟通向上帝之国的道路。法律是由于罪才出现的,但法律

没有能力使人摆脱他从摘取善恶树上的果子后堕落进去的那个世界,法律没有能力克服罪,甚至当法律被完全执行时,也是如此。”^[22]^[23]法律不能拯救人,也不能拯救堕落的世界,契诃夫恰恰参照俄国思想的宗教标准看到了社会反思的不足:“著名的六十年代没有为病人和囚犯做任何事情,从而违背了基督教文明的基本戒条。”^[23]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让自己的主人公来到西伯利亚并亲眼目睹法律惩治措施的局限甚至危害:法院判决有罪的那些人并不比仍享有自由的人更有罪或更危险,可是把罪犯们囚禁在西伯利亚服苦役,就会让他们处在人的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之外,遭受各种不必要的凌辱,使他们失去羞耻心和尊严感。更可怕的是,这些原本平平常常的普通人在横遭人为的虐待和恶劣环境的戕害后,自己也被惨无人道的暴行腐蚀,忘记了起码的基督教道德准则,出于自卫而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来。托尔斯泰以自己一贯的理性分析方法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对目前正在发生的这一切的唯一解释,照书本上所说的,是为了制止犯罪,威慑罪犯,改变罪犯和依法惩处。然而,事实上这四种作用根本就不存在。不仅没有制止犯罪,反而推广犯罪。不仅没有威慑罪犯,反而鼓励罪犯……不仅没有改造罪犯,反而系统地传播恶行。至于依法处处的必要,不仅没有因政府的刑罚而减少,反而在原本没有这种必要的人民中间培植了这种必要。”^[24]

对于西伯利亚苦役对普通人的腐蚀,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自己在“死屋”里的亲身经历提供了证明:原因全在于监狱和强制劳动无法感化犯人的心灵,只能惩罚他们,孤立他们以保证社会的安宁。这样的囚禁和苦役只能达到虚伪和表面的目的,实质上却“吮吸着人的生命之液,摧残、惊吓着人的心灵,使人的心灵衰弱枯竭,然后把这个精神上已枯萎成木乃伊的半疯的人,捧出来当作感化和忏悔的典范”^[25]。

无论是托尔斯泰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最关注的都是人在犯罪后精神更新和灵魂复活的可能

性。《复活》中聂赫留朵夫追随玛丝洛娃来到西伯利亚,不过不是像十二月党人妻子那样为了爱情和责任,而是既为了赎回自己曾经犯下的罪孽,也是为了帮助玛丝洛娃丢开放荡的生活,恢复灵魂的纯洁。经受了西伯利亚长途流放的艰难考验,他们也最终在西伯利亚认识到上帝的真理,实现了神圣的复活。结尾处聂赫留朵夫夜读《福音书》,以葡萄园比喻整个世界,弄清楚了一个想法:把世界从恶的折磨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每个人都承认自己在上帝面前永远有罪,因此他既不能惩罚别人,也不能改造别人。而人在上帝真理中的复活则保证了世界的真正救赎。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罪与罚》的尾声中,神圣的妓女索尼雅同样伴随杀人犯拉斯科尔尼科夫流放西伯利亚,也同样是为了帮助他认清自己的罪孽、服从基督的真理、实现精神的复活——然而这样的改造是何其困难!一开始,拉斯科尔尼科夫并不认为自己有罪,使他感到痛苦的只是那受辱的自尊心,因为他仍然为自己的思想而骄傲。他在生了重病神志昏迷期间所梦见(疾病和梦境都是更始仪式中半死亡的临界阶段)的景象解释了世界性灾难的根源:人人都以为只有自己掌握了不可动摇的真理,于是全世界都怀着无法理解的仇恨互相残杀。富有意味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种灾难称为一场“从亚洲内地蔓延到欧洲大陆”的世界性“瘟疫”,而“全世界只有几个人能获救,这是几个纯洁的特殊人物,他们负有创造新的人种和新生活的使命,使大地更新和净化”^[26]^[634-635]。大病初愈后,拉斯科尔尼科夫走到一条宽阔、荒凉的大河旁,从高高的河岸远眺西伯利亚的广袤土地:“那儿,在一片沐浴在阳光里的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牧民的帐篷像一个个隐约可见的黑点。那里是自由的,居住着另一种人,他们同这儿的人完全不一样,在那儿时间仿佛停滞不前,仿佛亚伯拉罕的时代和他的畜群还没有过去。”^[26]^[636]

这段与圣经传说相关的联想十分重要:被来自东方的魔鬼思想所迷惑的人,给世界带来了灾难,却在东方的西伯利亚看到了原初的被应许的福地和得

到上帝赐福的自由先民,找到了生命的活的泉水和拯救世界的道路。西伯利亚的辽阔土地所启示的神的真理,终于在罪人的心中点燃“复活和更新生活的希望”^{[26]637}。

遍布西伯利亚的苦役犯和流放犯所组成的边缘社群,破损严重的道路,白雪皑皑的荒漠,广袤无边而又密不透风的森林,冰冷黑暗的河流,这些地缘政治的、历史文化的和自然的因素的相互叠加,为把西伯利亚神话化为更始仪式的阈限阶段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这一阈限空间的半死亡状态,开启了在新的性质中个性复活和相应的生活更新的可能”^{[14]28}。俄国经典文学的主人公们将从这里的死亡之地获得精神复活的力量;而在俄国经典作家看来,他们对西伯利亚的观察、书写和领悟,将照亮俄国领袖世界的伟大前景。

参考文献:

[1]王晓菊:《西伯利亚开发与俄国现代化(1861-1917)》,《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

[2]ЛОМОНОСОВ М В, Краткое описание разных путешествий по северным морям и показание возможного проходу Сибирским океаном в Восточную Индию, https://www.booksite.ru/fulltext/russ_america/02_28.html。

[3]СОФРОНОВ В Ю., БОРКОВА Е В.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в письмах и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А. Н. Радищева. (Сибир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Тобольск, 2012. <http://zaimka.ru/sofronov-radischev>。

[4]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下册),项星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页。

[5]《契诃夫文集》(第13卷),汝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

[6]ЛОМОНОСОВ М В, Ода на день восшествия на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престол её величества государыни императрицы Елисаветы Петровны 1747 года, <http://rushist.com/index.php/rus-literature/4377-lomonosov-oda-na-den-vosshestviya-chitat-onlajn>。

[7]冈察洛夫:《巴拉达号三桅战舰》,叶子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冯维辛、格里鲍耶陀夫、果戈理、苏霍沃-柯贝林戏剧

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9]Гудкова Е. Ф. Хронотоп Сибири в русской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VII-XIX вв. <http://guuu7.narod.ru/HS.htm>。

[10]《涅卡拉索夫文集》(第3卷),魏荒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11]РАСПУТИН В Г, Сибирь, Сибирь, Иркутск: Издатель Сапронов, 2006, p. 24。

[12]АНИСИМОВ К В, От редактора, АНИСИМОВ К В. Отв. ред. Сибирский текст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сюжетн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М.: ФЛИНТА, 2014, p. 5。

[13]РЫЛЕЕВ К Ф, Войнаровский, http://az.lib.ru/ryleew_k_f/text_0010.shtml。

[14]ТЮПА В И, Мифологема Сибири: к вопросу о «сибирском текст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ибирский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2002, No. 1。

[15]УСПЕНСКИЙ Г И, Собр. Соч.: В 9 т. Т. 8, М.: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7, p. 383, 261。

[16]《果戈理小说选》,满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9页。

[17]《果戈理选集》(第2卷),满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1,338页。

[18]《普希金文集》(第2卷),乌兰汗、魏荒弩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309页。

[19]《十二月党人诗选》,魏荒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页。

[20]别尔德尼科夫:《契诃夫传》,陈玉增、邢淑华、傅韵秋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8页。

[21]КАТАЕВ В Б. Чехов плюс,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и, со времени, преемники,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4, p. 66。

[22]《别尔嘉耶夫文集》(第2卷),张百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3]《契诃夫文集》(第15卷),汝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24]托尔斯泰:《复活》,王景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422页。

[25]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曾宪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26]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岳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